

费孝通 著

中国绅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费孝通 著
惠海鸣 译

中国绅士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绅士/费孝通著;惠海鸣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

ISBN 7-5004-5341-8

I. 中… II. ①费…②惠… III. 社会结构—研究—中国 IV. D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1990 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3

传真 010—84017153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盛华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5.125

插页 2

字数 150 千字

定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
绅士

译者序

惠海鸣

CHINA'S GENTRY

回想 1987 年，我刚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做费老的博士生，试译《中国绅士》一书，到现在，已经是 18 年过去了。校读完此书，还是觉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得好：“有价值的著作，除非有丧失的章页，否则总是历久弥新，永远以初版的生动面目出现，永远不会在传统下古旧。所以，著作不会长久被误解的，即使最初可能遭到偏见的笼罩，在长远的时光之中，终会还其庐山真面目。也只有经历了时光之流的冲击和考验，人们方能来评论著作，而它的真正价值也才会显露出来。”^①

费孝通教授的英文著作《China's Gentry》（译名：《中国绅士》），虽然 1953 年在美国出版，以后又不断再版，在国外作为重要的教学参考书流传，费正清和莫里斯·弗里德曼等也多次推荐和引用过，但至今在国内还鲜为人知。此书是由费孝通教授在自己的《皇权和绅权》《乡土重建》二书中选出一些文章，于 1949 年左右口述给美国雷德斐尔德夫人。她回国后又独自整理、补充后出版。此书的不少内容虽然可以在上述的两本书里找到，但仍有独立的科学价值。此书的体系是崭新的，是一个新的逻辑体系，有些段落是重新写过的，有些是新加的。而且，我在翻译此书的时候，不断地翻阅上述两本书，也难以找到许多内容究竟是出自何处。所以，觉得仍然有翻译

^① 《人生的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2 页。

在封建制度崩溃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王位变为强者、权力追逐者的斩获对象。在封建制度下，政治权力是分配给君主的亲属和家族的，任何非生长于贵族家庭的人，就是一个平民。他没有机会做君王、接触到君王甚至看到君王的神圣用品。正如一个女人不能变成一个男人一样，一个平民也不能变成皇室人员。但是当封建制度终结之后，任何人都能成为皇帝。因此，政治权力成为斗争的一个目标。这是吴晗写的关于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故事：司马迁生活于汉王朝（公元前255—前207年），在观察汉朝的政治斗争的过程中，他写信给朋友说：“这是我有所了解的。”自从那个时代起，为了政治权力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在人们的眼中，政治权力已变为一件值得争取的珍贵东西，是大人物的一种事业。

不幸的是，自从中国的封建结构崩溃以来，政治权力不再永久地在一定的家族内传递，并且至今从未发现过能以和平手段来取得它。我们一直认为，获得政治权力的方式是“手持大棒”，打内战。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因此，我们不断地碰到暴君。少数人统治着群众。这种专制君主政体并没有因权力的传递和更换而改变。

在英国，当一个君主被杀掉的时候，君主力量的本身就受到打击。在一定时间内，君主的改变会导致人民权力

活的准则”^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社会学。目前中国社会的某些征候也有些像“似曾相识燕归来”。但是这一切究竟有什么道理？中国社会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人们如此？《中国绅士》一书是能给人们以启迪的。

在社会人类学历史上，曾经有人对马林诺斯基教授说：“如果当个人类学家可以维持生活，我也许会是一个伟大的人类学家。”但是，如果仅是考虑自己的饭碗的话，是永远不会成为伟大的人类学家的。费孝通教授的一生，直到耄耋之年，都在为实现自己的终身理想“认识社会，认识中国”作不懈的努力。他说过：“只是我们在青年时代曾想从事于建立这门学科，而走上了一条我现在认为正确的路——到中国现存的社会中去观察、调查、分析、研究。一切前人以科学方法得到的有关社会的理论都只是帮助我们进行这些工作的手段，我们应当向它们学习，但是绝不能用来代替我们自己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尽管我们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②

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用利奇教授的话来说，他和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教授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狂热的

① [美] 刘易斯·A. 科瑟著：《社会学思想名家》，石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4—35 页。

② 《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 页。

世代代尽力保持住。皇帝应该是仁慈的，他会原谅所有其他的罪行，但是不包括企图篡位的罪行。这是天下可能发生的最可怕的事情。任何读过明朝初期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那些威胁到王位的人，拷问记录似乎是通向地狱的记录。我被告知，地方佛教寺庙里的“十八层地狱”的模式，是对明朝实际所发生过的事的回忆。拷问、威胁是为了保护皇帝。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孩童时，玩耍时曾叫道“我是皇帝”，我的祖母立刻叫住了我，说：“你以后绝不能说这句话。”对她来说，这绝不是迷信或者过分谨慎，而是对随便说话的真实危险的认识。至少根据传说，皇帝们曾经杀死了预言家们预示的某天会成为皇帝的儿童。

但是这种暴力的威胁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保护了君主的权力。正如老子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有可能通过暴力来获得政治权力时，王位是有吸引力的。虽然那些当权派的野蛮行为可能使大多数人沉默下来，但是镇压永远不会完全地得到成功。因为对那些以帝国权力为重要赌注，不顾危险地企图实现其所有狂想的人，镇压不可能奏效。一方面，有些人将愿意拿他们的生命作赌注去夺取政权；另一方面，有些人温顺地服从着。因此，人们可能要问，人究竟应该选择哪一方面？

在君主统治下，人们只有责任而没有权力；皇帝的话

已知彼的较量中去克服限制的必需步骤。”^①以后他对知识分子历史分期的分析和江村五十多年的研究，都是一种理论、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方法的运用。这与他的功能方法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乔健教授称费老的学派为历史功能学派。的确，中国的现实社会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并非毫无来历，白纸一般。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历史往往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我们了解历史，是会有助于认识今天的社会的。这种实地调查和理论、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至少在费老这本书里已经作了开端。

尽管此书已经在外国作为重要的社会学专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张仲礼著的《中国绅士》一书的导言里，弗兰兹·迈克尔说，费教授的“这些关于民国时代有选择的描述与来自中国古籍的某些随想结合，并不能代表对帝国时代绅士的研究”^②。这种批评是够尖锐的了。但是我似乎能够理解他们批评的原因和方式，可能这是一种调查中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和社会学问卷方式的區別。这种区别可能在于，后者往往事先拟好带有一定项目的问卷，然后由调查员问之。这往往显得有准备，有逻辑，但是往往限于数量的调查，限于表面；而前者似乎没有

① 《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② 张仲礼著：《中国绅士》，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点。他必须找到一些办法来避免老虎的攻击。不幸，正如古话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那种时代，旅行是不容易的。一个人不可能逃到华盛顿或巴西去，也不可能在一个像香港那样的通商口岸，得到任何的国际避难。从自然地理环境上来说，是无法逃跑的。但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全面。我们知道，早年毕竟有一些人能够逃到朝鲜或者日本去。然而，普通人必须在这个社会本身的结构内找到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

然而，在这个中央君主体系中，有一个弱点。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皇帝本人把持着权力，但是他不能凭一人之力管理这个国家。即使他可能不希望与别人分享他的权力，他还是需要在统治方面得到帮助，因此必须使用官员。这些官员和统治集团是没有亲族关系的，仅仅是起行政权力的仆人的作用，而没有制订政策的权力。在这个无效率的体系中，普通的人发现他有机会去找到他私人所关心的东西。

的确，在秦（公元前221年）统一之前，人们就企图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体系。这是在法家或者说是在左派思想流派的影响下去做的。从理论上说来，这个思想派别所提倡的体系是好的。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某种法律基础必须建立起来，每个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商鞅作为秦的首相，企图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但是这个

动，而且要抓住典型，具体地调查研究绅士所处的乡村、城镇和都市的社会结构和情景。同时，正确的社会结构的概念应该来自于实际生活，同时又是对实际生活的概括。对于今天的社会人类学者来说，这仅是一种起点，它可以启发我们写一个调查提纲，认真地从头开展我们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实地调查。我们相信这是费老对我们后来者的希望所在。诚如雷德斐尔德在序中所说，此书是“费孝通关于从革命的中国跨进共产主义的中国门槛的观点和判断的表达”。书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国需要新的领导和改革”。这是《中国绅士》一书的结论。在社会腐蚀潮流的冲击下，逼得农民起来造反，生活、经济、政治和道德的种种问题摆在中国面前，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无能为力，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费孝通说，“乡土重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①。而且，“言论的充分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本条件，只有在民主社会中，人民才能真正的提高他们对自身生活问题理解的水准，使他们能得到从理智里发挥出来的共同意见，产生负责任的一致行为”^②。

读费老的文章是一种享受。这里且不说“应是鸿蒙借君手”，就从费老的这本书来看，也感到这种功力是冰

① 《费孝通文集》第4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乡土重建》，第439页。

② 同上书，第421页。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从英文中，仍感到费老的文章是那么好读，那么生动，那么明晰。费老当时正处于四十岁左右，希腊人所谓的鼎盛时期，我们可以感到他壮年气盛，才华洋溢，而且不断地在进步中。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米尔斯曾经说过，有一种“特有的心智素质可以被称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思考人们实际上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以及思考人们感到自己所需要的是什么呢——这是一种特有的心智素质，这种素质帮助人们运用所了解到的情况，帮助人们发展理性，以便清醒地总结世界上正进行的事，总结在他们之中还有什么事可能发生”^①。无疑，费老正是有着这种丰富的社会学想象力的。

让我们向费老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以中国社会为最好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正从古老的、传统的、乡土的社会转变到现代化的社会。这个过程我们要记录下来，分析清楚……我们有责任帮助大家看到事物的本质。我们的社会学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的社会学，而是为建设服务的社会学”^②。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会感到路子愈走愈宽，真如源头活水来，再也不会感到理论工作没有搞头了。

① 《社会学与社会组织》，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② 北大社会学系编：《社会研究》1987年第2期，第171页。

最后，我要对支持和帮助过这本书出版的费宗惠、张荣华、潘乃谷老师以及惠小兵、陈伯坚、郭晓鸿、倪明、金娟等同志表示诚恳的谢意，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批评，此书是不可能出版的。

1992 年初稿 2005 年 11 月修改

中国绅士

序

罗伯特·雷德斐尔德

CHINA'S GENTRY

—

对于西方读者来说，费孝通的出名是因为他是以下三本书的作者。一本是关于中国村庄生活的简明的、启发性的书（《乡村经济》，英文名 *Peasant life in Chin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39），另一本是关于中国西南的农业和工业的更为成熟的著作（《泥土中国》；英文名: *Earthbound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48）；以及由“中国社会绅士”为主题的起了很大激励作用的文章组成的现在这本书。在中国，费孝通的知名，还因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教师，社会学实地研究的领导者和先锋，他还是一个笔锋敏捷、博览群书的人。他无所畏惧地为解决中国巨大的社会问题而努力着。在伦敦 B. 马林诺夫斯基门下，他得到了博士学位。归国之际，正值抗日战争，他加入了中国学生和学者的行列，在云南省继续他作为中国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在这里，他得到的研究结果是他的第二本书（*Earthbound China*）。在打败日本之后，他回到他的母校——北平的清华大学教书。在这里（我于 1948 年冬天作为一位访问教授来到这所大学），我和妻子与他恢复了旧日的交往。

本书是由费孝通于1947—1948年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所组成的。1948年秋天，他把这些文章大略地翻译成英文，口述给我的妻子，对听写的要点，还停下来讨论。在这个过程中，部分内容被重写并且扩大了篇幅。预料共产党人将会控制局面，这项工作是粗略地完成的，但不乏热情。因为当口述和重写进行的时候，共产党人的力量已控制了北平，进而控制大学和城市也是指日可待的。1948年12月，大学的大多数学生和大多数教职员都期待共产党人到来，解除困难和压迫，并且有一个新的机会来应用他们的知识来改善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深知国民党政府下的腐败和暴行，这种希望压倒了理解。总是乐观和有勇气的费孝通的意见是，他能够为共产党人努力工作，而且当他认为批评得正确时，他将继续他的批评。像这所大学里的其他人一样，他并不认为将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府会依照斯大林主义的俄国的观念而行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像他一样是中国人，他在共产主义者的电台里听到他的老朋友和学生们的声音，他们对北平人民做出了很多许诺。因此费孝通告诉我们，他希望变成共产党政府的一个“忠实的对立面”。当时，他已经在国共两党之间失宠。在云南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威胁要逮捕他，并且在他发表不利于蒋介石集团的言论的公开集会上受到枪击；另一方面，北方的共产党电台为了费孝通

已经出版的一些文章而激烈地攻击他。然而，整体来说，费孝通感到他关于发展中国工业和农业的观点，将会和新制度的利益相合，并且在转变之后，他将能够继续工作，为中国说话。在希望中，几乎是充满信心之中，他口述了收集到的这些文章。

1948年12月，我和我的妻子离开了北平，从那时到现在的三年多，我们从费孝通那里未得到只言片语。只是从别人那里，我们得知了他的一些简单的经历。那时，北平已被共产党掌控，毛泽东要费孝通承担一个城市再建设问题的研究项目，他接受下来，开始了工作。费孝通发表了文章，赞扬中国的“新民主”。他担任了政府的或委员会的委员。后来，他开始研究中国西南的一些边远社会——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工作于此地。后来又有消息告诉我们，他已经回到了清华大学。

自从他口述大意给我妻子之后，这本书的出版便没有他本人的任何参与。很明显，他知道，与西方人的交往会给他带来麻烦或者危险；他不再写信给我们，而我们也停止写信给他。我的妻子编辑了这本她已经翻译好的书，在各部分次序变动中，承担了责任，添了注释，甚至插进了一些词组或整个句子。当时，她认为这样补充后，费孝通的意思会周到些。值得强调的是，此书表达了当时的费孝通从革命中国跨进共产主义中国的观点和判断。他写下了当时他的学生们（其中许多是我知道